

空间的“遗忘”与“召回”

——海德格尔对康德空间观的存在论解构与奠基

郑欣妍

华南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广东 广州

收稿日期: 2026年6月6日; 录用日期: 2026年6月28日; 发布日期: 2026年7月9日

摘要

海德格尔对康德空间观的存在论解构, 标志着空间问题从认识论范式向生存论范式的根本转向。在西方哲学空间概念的双重演进脉络中, 康德将空间确立为“直观的形式”, 奠定了知识论的先验基础, 却也导致了空间存在论维度的“遗忘”。其“形式的直观”所引发的时空统一性疑难, 更暴露出先验哲学的内在困境。通过对“先验想象力”的存在论阐释, 海德格尔将这一悬置于感性与知性之间的能力, 转化为时空统一性的存在论根基, 使先验统觉得以向“此在”的生存论结构转化。在《存在与时间》中, “在之中”、“去远”与“定向”等概念共同构建起以操劳实践为特征的生存论空间观, 完成了空间从认知形式向存在之境的哲学“召回”。

关键词

海德格尔, 康德, 空间, 存在论

The “Forgetting” and “Recall” of Space

—Heidegger’s Ontological Deconstruction and Foundation of Kant’s Concept of Space

Xinyan Zheng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Received: June 6, 2026; accepted: June 28, 2026; published: July 9, 2026

Abstract

Heidegger’s ontological deconstruction of Kant’s concept of space marks a fundamental shift in the problem of space from an epistemological paradigm to an existential one. Within the dual evolutionary context of the concept of space in Western philosophy, Kant’s establishment of space as the

文章引用: 郑欣妍. 空间的“遗忘”与“召回” [J]. 哲学进展, 2026, 15(7): 45-50.

DOI: 10.12677/acpp.2026.157305

“form of intuition” laid the transcendental foundation for epistemology, yet it also led to the “forgetting” of the ontological dimension of space. The difficulty of the unity of time and space, triggered by his concept of the “form of intuitive understanding,” further reveals the inherent predicament of transcendental philosophy. Through an ont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transcendental imagination,” Heidegger transforms this faculty, suspended between sensibility and understanding, into the ontological ground for the unity of time and space, enabling the transcendental apperception to be transformed into the existential structure of “Dasein.” In *Being and Time*, concepts such as “Being-in,” “de-severance,” and “directionality” collectively construct an existential concept of space characterized by practical concern, accomplishing the philosophical “recall” of space from the realm of cognition to the horizon of existence.

Keywords

Heidegger, Kant, Space, Ontolog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关于空间的本性问题，西方哲学史上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理解范式。王晓磊曾将这一思想史梳理为两条演进脉络：一条是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的“形而上学”空间观，另一条是从笛卡尔到梅洛-庞蒂的“主体-身体”空间观[1]。这一划分虽不免有简约之嫌，但它清晰地揭示了一个关键事实：康德恰好处于这两条脉络的交汇点上——他既继承了形而上学的空间追问，又开启了主体性哲学的空间转向。正是这一双重身份，使康德成为海德格尔不得不首先面对、又必须超越的哲学坐标。

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先验感性论”中，康德将空间界定为“直观的形式”，从而将其确立为人类认识的先天条件[2]。这一工作看似解决了空间的本性问题，实则开启了一段更长的“遗忘”史。韩水法在分析康德先验哲学时指出，康德哲学的根本转向在于将哲学任务从“认识对象”重构为“认识方式”，即追问认识的可能性条件本身[3]。这一判断准确地抓住了康德哲学的“先验”特质，但也提示我们：当哲学完全转向认识论时，存在本身的问题便不可避免地悬搁了。正是这一悬搁，为海德格尔后来的存在论发难埋下了伏笔。

尚杰在分析海德格尔如何转化康德哲学时指出，海德格尔的关键策略是将认识论问题扭转为存在论问题，以“此在”与“时间”为核心重构哲学方向[4]。这一判断虽然正确，但尚需进一步追问：海德格尔究竟是通过什么具体的概念操作完成了这一转化？罗永斌提示了一条重要线索：海德格尔提出的“周围世界空间”概念，奠基于此在的“空间性”与“世界性”，实现了对笛卡尔-康德空间观的创造性转化[5]。然而，“周围世界空间”如何从康德的“直观形式”中生长出来？这需要回到海德格尔对康德“先验想象力”的解读中寻找答案。

张志伟从视角哲学的角度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补充。他认为，海德格尔实现了从康德的复数第一人称视角——“我们如何认识”——向单数第一人称视角——“我如何存在”的转向[6]。这一视角转换的实质，是从“认识的一般条件”转向“存在的具体境域”。而陈亚立对“去远”概念的专题研究则进一步具体化了这一转向：他指出，“去远”并非否定客观距离的存在，而是揭示了一种比物理测量更本源的空间经验——此在通过操劳活动让事物以“切近”的方式照面[7]。这一解释抓住了海德格尔空间观的核心

洞见：空间的本质不在“有多远”，而在“近不近”。正是这种将空间问题从“客观测量”转向“生存关切”的思路，构成了海德格尔对康德空间观的根本超越。张浩军将这一思路概括为海德格尔对“流俗空间解释”的消解和对“源始而本真的空间”的还原[8]。至此，海德格尔的空间哲学图景已初具轮廓。

在进入正文分析之前，有必要澄清本文使用的三个核心术语。“解构”在海德格尔那里并非否定或摧毁，而是对传统“本体论”概念进行批判性的“拆除”与“还原”，旨在揭示被历史遮蔽的源初经验。“存在论”区别于“本体论”的传统译法，在本文中专指对存在本身的意义(Sein)的追问，而非对存在者的分类研究。“奠基”在此不是逻辑上的演绎关系，而是现象学意义上的“根据揭示”——表明生存论空间性比认识论空间更为本源。

2. 康德的“直观的形式”及其统一性困境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先验感性论”中，通过“形而上学阐明”与“先验阐明”的双重路径，将空间确立为“外感官的形式”。在“形而上学阐明”中，他提出四个核心论题：空间不是从外部经验中抽引出来的经验性概念，而是先天的纯粹直观；空间具有严格的普遍性和必然性；空间不是推论性的概念，而是纯直观；我们只能表象一个唯一的空间，所谓“许多空间”不过是同一空间的部分[2]。在“先验阐明”中，他将空间与几何学的可能性相联系，证明空间作为先天直观形式是几何学这一先天综合知识得以可能的条件。康德由此得出结论：空间具有“经验性的实在性”——事物在空间中遵循几何学关系；同时具有“先验的观念性”——空间对物自体无效，只是主体内心的观念[2]。

然而，这一论证体系内部存在着根本性的张力。康德一方面将空间规定为感性直观的形式，强调其接受性和被动性；另一方面又承认，直观杂多的统一必须依赖于知性的自发综合活动。统觉的分析的统一只有在统觉的某一种综合的统一下才是可能的，而这种综合统一是知性的工作(B132, B133) [2]。由此产生了“时空表象统一性疑难”：纯粹直观本身的统一性究竟源于何处？如果统一性来自知性，空间就不再是纯粹的感性形式；如果空间仅仅是形式，其自身的统一性又无法得到说明。这是一个两难困境，康德始终未能给出令人满意的解答。

在时空关系上，这一统合难题表现得更为突出。康德指出，时间是内感官的先天直观形式，空间是外感官的直观形式。他似乎更看重时间，认为一切外部现象最终要纳入到内心中来感知，因而时间具有优先地位。一切现象都在时间中，以时间为持存的基底(B226) [2]。但他又指出，如果没有对空间杂多的综合，例如空间的直线运动模型，我们无法理解时间的流逝(B154) [2]。这似乎陷入循环论证：空间杂多是时间内感官形式联结杂多的条件，而时间形式又是空间形式的优先前提。

邓晓芒曾尖锐地指出，康德时间观的核心困境在于：一方面将时间视为比空间更根本的内感官形式，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借助空间中的持存之物来理解时间的流逝[9]。这一悖论揭示了康德主体性哲学的根本限度——认识论范式无法在自身内部解决时空统一性的终极根据问题，因为这一问题已超出认识论的范围，指向了存在论层面。韩林合对康德“我在思维”命题的考察进一步揭示了这一困境的根源。他指出，“我在思维”作为先验命题，既是认识论的逻辑基点，又不可避免地包含了“我存在”这一存在论承诺[10]。这意味着，康德的认识论体系虽然在理论上试图将存在论问题排除在外，却在实践中无法回避它。正是这一“无法回避”，为海德格尔从“我思”通向“此在”提供了理论通道。海德格尔正是抓住了这一缺口，将康德的“疑难”转化为自己的“起点”。

3. “先验想象力”的存在论阐释

海德格尔对康德空间观的解构，其关键一步是通过重新阐释“先验想象力”来实现的。在《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中，海德格尔敏锐地捕捉到康德论述中一个看似摇摆不定的关键：想象力既被归于感性

能力,又展现出明显的自发性和综合能力,因而尴尬地悬置于感性与知性之间。想象力既具有“生产性”,能够经验直观到存在物,又能从虚无中创生出未经验的形象内容。

海德格尔指出,康德将超越论想象力视为一种与纯粹感性和纯粹知性并列的第三种基本能力。它并非派生于其他能力,而是使感性与知性的源初统一成为可能,从而构成对象经验可能性的本质基础。然而,康德在著作的整体架构中,却仍倾向于将心灵能力划分为“感性与理性”两个枝干,并相应地将批判体系区分为“超越论感性论”与“超越论逻辑论”[11]。这一划分导致超越论想象力在体系中并没有确定的位置,既不属于纯粹的感性论,也无法完全纳入以思维为本的逻辑论,从而成为某种“无家可归”的能力。靳宝在分析康德“直观的形式”与“形式的直观”时指出,这一张力表明康德在感性与知性之间留下了一道无法弥合的裂缝[12]。而这道裂缝的深处,恰恰隐藏着空间统一性的真正源头。

海德格尔借用康德将时空之纯粹直观称为“源生性的表象”之术语,指出“源生性”并非心理学意义上的产生,而是源于“源发性直观”中的“使发生”。这正是纯粹想象力才有的双重特征:既直观到存在物——使表象生发成为可能,又创生形象内容——表象时空。构成纯粹直观本质的纯粹综合只有在超越的想象力中才是可能的。[11]在纯粹直观中直观到的东西之整体不具有概念普遍性之统一性,这种同一性不由知性的综合产生,而只在超越论的想象力中才是可能的。因为:如果把“直观的形式”看作一个抽象的、形上的整体,我们无从解释其统一性的来源。

海德格尔进一步论证,感性作为有限直观,其本质在于“领受自身给予着的東西”,而超越论的想象力作为纯粹有限直观,不仅是感性的,更是所有认知能力可能性的条件。思维的统一性必须通过更在先的“表-像”活动,这种“让对象化”的基本过程同时也是表象“面向”随之外化的“自我”的过程。“自我”在其“我思”中是其所是,则自我的本质处在“纯粹自我意识”中。这种意义上的“思”就是纯粹想象活动,即自我转向的对自身的关涉。纯粹知性因此是“自发的”对统一性境域有所表象的前象活动,这一发生过程出现在“超越论图式化”中。

海德格尔由此为康德“我思”的先验性提供了存在论解释:既然康德说纯粹图式是想象力的一个超越论的成果,那么基于超越论想象力之上的纯粹图式化的知性过程就构成了源初的知性和形上的“我思实体”[11]。这一解释的关键在于,它将康德那里作为逻辑预设的先验统觉,转化成了一个具有发生学意义的存在论事件。“我思”不再是静态的逻辑条件,而是在想象力的综合活动中不断自我产生和维持的动态过程。

海德格尔这一解读并非没有争议。袁建新指出,海德格尔因未能看到空间概念的“直观性的所予本性”,对《纯粹理性批判》作出了根本性的误读。从康德立场看,空间首先是直观性的所予概念,无需借助先验想象力即可直接呈现;海德格尔将想象力抬高为感性与知性的“共同根”,恰恰颠倒了奠基关系[13]。海德格尔对此可以回应:他所追问的并非空间如何在直观中被给予,而是这种给予活动本身何以可能。这一追问恰恰暴露了康德先验哲学无法回避的存在论预设。双方的争论表明,空间问题的真正分歧在于:统一性究竟应奠基于直观性的所予概念,还是生存此在的操心结构。

4. 生存论空间性及其时间性根基

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完成了对空间的最终“召回”。他首先对“在之中”这一核心概念进行了深入探讨。海德格尔明确指出,此在的“在之中”不同于一个物体在空间容器“之内”的现成存在。后者是指一个具有广延的存在者被另一个广延物所包围,两者都静态地置于一个预先给定的空间之中。而前者是一种更为本源、对此在具有建构作用的空间性,必须从“世界”本身的角度来理解[14]。

如果空间在某种意义上组建着世界,那么在分析世界内存在者时,其空间维度便不容忽视。上手事物最显著的空间特性并非其坐标位置,而是其“切近”的性质。这种“近”远非由测量距离所决定,而是

由操劳活动中“寻视”的实践性考量所调节。海德格尔以眼镜为例：戴在鼻梁上的眼镜，从物理距离来看离眼睛最近，但在操劳活动中恰恰是最不切近的，因为越是得心应手，它就越“不显眼”，越是退入到不被注意的背景之中。相反，对面墙上的画虽然物理距离更远，却可能因为被观赏而成为切近的。这说明，日常生活中的远近，并非由客观的物理尺度决定，而是由操劳的寻视所估量的“其远几许”来调节。

这种由寻视调节的切近，总是关联着用具的“方向”。一件用具并不仅仅在空间中有一个随便的“地点”，它本质上是“配置的、安置的、建立起来的”。因此，用具具有其特定的“位置”。这个位置不是物体现成所在的“何处”，而是其在一个用具联络整体中“各属其所”的“那里”，即“场所”。场所不是由诸多现成物拼凑而成的范围，而是操劳地寻找事先已然理解的“何所在”。我们周遭的空间性，正是由依场所确定的诸多位置所构成的“周围性质”。空间的三维性最初就隐藏在这种上手事物的空间性中，由寻视所揭示，而非由几何学测量所界定。

此在的空间性具体显示为“去远”与“定向”两种性质。“去远”作为此在在世的在存在方式，并非指增加距离，恰恰相反，它是一个积极的生存论活动，其核心在于消除某物之远而使之切近。此在具有去远求近的本质倾向，它通过操劳活动让世界上的事物以切近的方式前来照面。

与“去远”一体两面的是“定向”。任何“接近”都已先行采取了朝向某个场所的方向。此在总已经在被揭示的、熟悉的世界中活动，并从这个背景出发为自己制定方向。因此，固定的方向——如左和右——并非源于一个无世界主体对其身体的“单纯感觉”，而是源自此在总已寓于其中的上手世界的用具联络。海德格尔借此批判了康德的方向观：一个人走进一间他熟悉的房间，但房间里没有灯，他需要摸索着找到一把椅子。在这个过程中，他之所以能够在黑暗中辨别方向，依靠的不是对左右的身体感知，而是记忆中已然熟悉的世界性背景——他知道门在哪个方向，窗在哪个方向。这说明，定向的可能性根本上奠基于“在世”这一生存论建构。

由此，海德格尔纠正了传统的空间观：既非空间在主体之内，也非世界在空间之中。恰恰相反，是“具有空间性的”此在通过其组建性的在世，使得空间“在世界之中”得以展开。空间的“先天性”并非指它先验地属于一个无世界的主体，而是指“只要此在在世，空间就已经随同上手事物一同照面”这一生存论事实。

只有当寻视将空间性本身作为专题——如测量与计算——周围世界的空间性才会被“中立化”，失去其因缘性质。周围世界异化为“自然世界”，纯粹的单质空间——即自然科学所研究的空间——才得以显现。然而，这种专题化空间的存在论基础，恰恰在于此在源初的、被世界化的空间性。结论是根本性的：唯当回溯到世界，才能理解空间；唯当基于此在的“在世存在”，才能揭示空间性的本质。空间，是参与组建着世界的空间。

5. 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海德格尔对康德空间观的存在论解构与重构，不仅是对认识论范式的超越，更是对空间问题本身的存在论“召回”。通过揭示康德“直观的形式”背后隐含的统一性困境，海德格尔指出，空间性的根源不在先验主体的认识形式中，而在“此在在世”的生存实践中。他以“先验想象力”为枢纽，将康德的先验统觉转化为存在论意义上的源初发生场域。在《存在与时间》中，空间性被阐释为“去远”与“定向”的生存论结构，是此在在世操劳中展开的意义境域。那种认为海德格尔哲学缺乏对空间问题正面论述的观点，往往源于对“此在”存在论结构的狭义理解。事实上，海德格尔的空间观是“基础存在论”在生存论领域的具体展开，建构了一套以操劳实践为特征的空间学说。空间不再仅仅是认知的形式条件，而是此在栖居于世界之中的根本方式。对这一思想的深入发掘，不仅有助于理解海

德格尔与康德的思想继承关系，也为反思当代技术世界中的空间体验提供了重要的哲学参照。

参考文献

- [1] 王晓磊. 论西方哲学空间概念的双重演进逻辑——从亚里士多德到海德格尔[J].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12(2): 113-119.
- [2] 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M]. 邓晓芒,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B38-39, B132-133, B154, B226.
- [3] 韩水法. 论康德的先验哲学与形而上学[J]. 哲学分析, 2024, 15(6): 3-24.
- [4] 尚杰. 海德格尔如何转化康德哲学[J].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49(4): 32-41.
- [5] 罗永斌. 海德格尔论生存论空间——对笛卡尔广延空间的解构与超越[J]. 宜宾学院学报, 2025, 25(1): 24-33.
- [6] 张志伟. 第一人称视角的困境与转向——围绕康德与海德格尔的思考[J]. 中国社会科学, 2025(3): 167-183.
- [7] 陈亚立. 此在空间性中的“远”与“近”——兼论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的空间观[J].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42(4): 17-24.
- [8] 张浩军. 论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的空间观念[J].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10(2): 115-120.
- [9] 邓晓芒. 康德时间观的困境和启示[J]. 江苏社会科学, 2006(6): 14-20.
- [10] 韩林合. 康德论“我在思维”与“我存在”之关系[J]. 哲学动态, 2023(4): 78-86.
- [11] 海德格尔. 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M]. 王庆节,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
- [12] 靳宝. 直观的形式与形式的直观——论海德格尔对康德时空表象之统一性疑难的解决[J]. 世界哲学, 2025(2): 149-159.
- [13] 袁建新. 康德的空间概念——基本意蕴及对解读《纯粹理性批判》的重要性[J]. 哲学研究, 2023(8): 106-117+128.
- [14] 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M]. 陈嘉映, 王庆节,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